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比较与启示*

成德宁

摘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在本国工业增长、农业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环境也比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宽松得多。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发展的地位,城镇往往是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成为输出原材料、输入宗主国制成品的“飞地”。由于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工业化迟迟未能启动,农业发展停滞,大批农村人口被“推向”城市,出现“城市病”和“过度城市化”现象。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关键要处理好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城镇体系内规模和层次、城镇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城镇化模式 工业化 农业发展 比较研究

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循环演进和增强的机制:一方面,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内生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从而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因此,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城镇化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果也很不一样。西欧和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工业化总体上是比较协调的,是一种同步型城镇化。而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往往出现城镇人口过快膨胀、失业问题严重、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城乡差别扩大等问题,以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其过快的城镇化一直表示担忧。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效果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城镇化的模式是分不开的。因此,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对于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化的农业基础比较

农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城镇化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如果农业生产效率没有显著提高,农产品剩余没有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就难以持续下去。因此,正如斯密所言:“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效果的不同,首先应归因于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具体时间是:英国 1690—1700 年;法国 1750—1760 年;美国 1760—1770 年;瑞士 1780—1790 年;德国和丹麦 1790—1800 年;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 1820—1830 年;西班牙 1860—1870 年。^①这场农业革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成为可能。西欧从总体上来看,农业的加速发展比工业和城镇加速发展一

般要早 30 年到 50 年。例如,率先进行工业化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前便开始引进和吸收荷兰先进的农业技术,不断进行农业技术创新。从 1700 年以后,英国曾一度成为当时“欧洲的粮仓”。一直到 1840 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约 80 年以后),英国粮食才开始依赖于国外的进口。^②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通过机械的引进和化肥的使用,工业反哺农业,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农业在生产率和产量上均实现了新的飞跃。尤其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十分突出,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代替了大部分农业劳动。在美国,1840 年收割一公顷小麦需要 60 个小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只需要 17 个小时。另据估计,在 1880—1980 年的 100 年间,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 21 倍,法国增长了 13.6 倍,日本增长了 14.2 倍,丹麦增长了 13.3 倍,英国增长了 6.4 倍。^③在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与城镇化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农业发展创造的农业剩余为人口脱离农业部门进入城镇工业部门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工业增长和城镇化,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又为农业提供机器、化肥、储藏设备和运输工具,并为农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给予农业生产以决定性的刺激。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但农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停滞。例如,美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迅速的时期,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量增长的速度几乎与制造业和矿业一样快。在 1870—1930 年美国工业化的鼎盛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9%,农业年均增长则为 2.5%,人均农产品一直是持续增加的。^④

与西欧和北美发展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工业化之时,普遍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尽管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 60% 以上,农业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 左右,但分配到农业部门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大约只有 12% 左右。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值以每年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道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简新华教授,项目号:2001ZDXM 79005。

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农业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1970年以前的20多年里,整个发展中国家每年人均粮食生产和人均农业产出的增长都不到1%。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人均农业产出增长率是零。非洲的情况则更为严重,60和70年代人均粮食和农产品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⑤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以发展中国家尽管大部分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产品却还不能自给。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所需的农产品还不得不依赖进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1934—1938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粮食贸易顺差400万吨。但从5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出口逆差越来越大。例如,1948—1952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逆差600万吨;1958—1962年每年逆差1500万吨;1968—1972年每年逆差2400万吨;1978—1982年每年逆差6600万吨;1983—1987年更是每年逆差7700万吨之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工业高速增长难以持续下去,而且使其农村日益陷于贫困的境地,出现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象。尽管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所谓的“绿色革命”,大面积推广和种植新型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土地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在绿色革命过程中,小农经营的土地成本上涨,而农产品价格却由于大农场产量增加而下跌。结果,绝大多数小农的收入不是增加反而下降了,日益增长的农业产出伴随着日益增加的贫困。而乡村人口的贫困又推动大量人口流入城镇,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爆炸,出现所谓“过度城市化”的问题。

二、城镇化的工业基础比较

工业化是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发展程度可以看作是社会分工水平的一个明显标志,而分工越深化,对城镇化的需求也就越迫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自然,工业化的模式是影响城镇化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化的后来者,两者进行工业化的条件很不相同,两者城镇化的模式也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作为工业化的先行者,其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内生的,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源于社会内部经济结构自身产生的创新,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例如,西欧国家的近代工业往往是其自身传统手工业蜕变而来的。这些传统手工业在包买商的支配下,首先转变为分散的手工作坊,再过渡为集中的手工工场,最后在机器动力广泛使用后聚集到城镇发展为近代工厂。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当传统城镇的手工业由于行会制度的制约而逐渐衰落下去之时,不受封建行会限制的乡村工业却蓬勃发展起来。大量的手工业从城镇迁往乡村,在水流湍急的乡村河谷地带设立作坊。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国家的乡村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便得到很大发展。西方经济史学家把西欧历史上这种乡村工业的大发展称为“原初工业化”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把它视为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⑥这种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表现最为突出。据英国著名人口史家利格利(E.A.Wrigley)的估算,1520年时英国城镇人口(5000人以上的城镇)仅为13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5%,在227万农村人口中,从事

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有45万,占农村总人口的20%,占全国总人口的18.5%。到1750年,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到21%,农村非农业人口增加到191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由18.5%上升到33%。^⑦这表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54%)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转移到各种乡村工业中,实现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顺利转移。这种农村非农化发展使许多乡村地区转变为“工业村庄”,并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这些村庄,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例如,以伯明翰为中心的西密德兰“黑乡”铁工业区就是著名的乡村工业区。自16世纪起发展制铁业,兴起许多工业村庄,后来,许多工业村庄都发展成为城市。特别是伯明翰1660年时还是一个市场小镇,到1801年时发展成为英国第四大城市。

此外,英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大多是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起步的。直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重工业才逐渐取代轻工业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角。这种渐进式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出非农业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吸纳农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工作,避免城乡差别扩大。例如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就是以纺织业作为突破口的。纺织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工业,所需资本甚少,所需劳动力则多。这样,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工业的增长与工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在这些国家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工业部门劳动力和产值所占比例都显著上升,使流入城镇的人口能够顺利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在工业化之前,也有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尤其在中国,明清时代江南的纺织业就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机器生产的商品渗入,传统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原初工业化不但不能顺利过渡到工业化。相反,这些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后,还出现了“非工业化”倾向。例如,印度曾是棉纺织品的生产大国,但自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以前的乡村手工业消失了。在1815—1932年间,印度棉纺织品出口值从130万英镑降至10万英镑以下。在同一时期,出口到印度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26000英镑上升到40多万英镑,增加了约16倍。到1850年,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出口棉纺织品到全世界的印度却进口了英国棉布出口的1/4。^⑧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沦为殖民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城镇,其主要功能只能是宗主国控制和管理殖民地的行政中心和输出原材料和输入制成品的中转地,而不是带动本国农村发展的中心。这些城镇主要是为出口经济而建造的,一般都布局在沿海地带。例如1532—1650年间,巴西建造了6座城市和31个城镇,均位于沿海地区。而巴西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接触还不如同里斯本的接触密切。总之,这些殖民地的城镇化,不是建立在本国自主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而主要是为核心国家获取原料、销售产品服务的。这些城镇在文化上与周边地区相对疏远,在经济上则是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工业发展和国内市场交换关系发展的结果。其结果是城镇传统服务业膨胀,而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但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重却没有超过20%~30%

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开始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一种外源或外诱的工业化,它往往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的。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内容基本不变,但工业化的条件与西欧和北美大不一样。首先,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时,欧洲和北美这些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已经存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其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固定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与发达国家当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发展中国家引进的现代工业技术主要是适应发达国家生产要素条件的,往往是一种以资本代替劳动的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当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相比,产业资本密集程度要高得多,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赶不上制造业产量的增长。工业化只能为少数人提供十分有限的就业机会,使发展中国家流入城镇的人口很难在正规的制造业部门就业。他们从乡村流入城镇后,或是失业,或是就业不足(指一个劳动者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能够并愿意工作的时间),或是错误就业(Misemployment,指劳动者虽然从事全时工作,但其工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没有任何好处。例如乞讨、偷盗等活动)。从而给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令各国政府十分头痛的“城市病”。

三、城镇化的人口环境比较

欧洲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1880—1900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58%左右,而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城镇化最快的时期(1960—1970)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却高达4.21%,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远快于发达国家。这样迅猛的城镇人口增长给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交通拥挤、城镇失业和贫困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所以担忧甚至反对城镇化,并不是担心和反对城镇化本身,而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超出了经济发展速度,因而要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当然,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的过快增长除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贫困等因素外,也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比发展中国家低得多,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没有今天发展中国家这样快。尤其是19世纪,许多发达国家城镇的人口死亡率一直比乡村地区还高。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认为,那些使城镇死亡率降低的公共健康和卫生改革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在19世纪的英国,城镇是杀手”。二是欧洲大量人口向新大陆移民,减缓了欧洲本身的人口压力。据估计,1875—1880年期间,每年平均有28万人口横渡大西洋。1880—1885年每年人数增至68.5万人,1885—1890年每年达到78万人,1890年以后略降至73万人左右,但1910年达到每年200万人从欧洲离境的高峰。齐波拉估计在1846年到1930年期间,共有5000多万欧洲人移居海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欧等国家人口出生率较早地受到抑制。西欧在人口转变之前,绝大多数家庭即为核心家庭,很少有传统家庭那种几世同堂的现象。^⑤这种核心家庭的模式意味着子女在结婚后便离开父母姻亲,自己成家立业。所以一个人要想结婚、成家,自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自己的份地、房屋。霍曼斯(Homans)教授认为,

在中世纪的英国,婚姻与是否拥有份地维持家庭生计紧密相关。“没有土地就没有婚姻”是社会的共同观念。由于其独特的“西欧婚姻家庭模式”,西欧社会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不但初婚年龄普遍偏高,而且独身者比例也很高。¹⁰这是主动抑制人口增长、防止人口与资源出现高压紧张关系的有效的手段。也就是说,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就存在许多抑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机制,出生率在19世纪初便降到比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60年代还低的水平上。

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普遍的早婚,婚内也不采取抑制生育的措施,使其出生率一直维持在比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前还高的水平上。同时,由于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保健设施的普及和防治疟疾、天花、霍乱的疫苗的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当年下降的速度要快得多。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1960—196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高出19世纪发达国家的1倍以上,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过去一个世纪营养改善、医疗技术进步的牺牲品。

四、城镇化比较的启示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了一系列反城镇化的政策,严格控制乡城人口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城乡间制约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化壁垒始终没有消除,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被限制在农村地区,出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分散农村工业化模式,“工业国家、农业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城镇化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症结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调整城乡结构已经成为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预计到“十五”期末,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左右,2010年将有望达到50%。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我国21世纪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1. 处理好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是相互依存的:农业和农村如果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就无法为工业和城镇增长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城镇工业产品和服务也会缺少市场需求;同样,如果没有现代工业部门作为依托,没有城镇市场需求的刺激,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实现城乡实现一体化发展,关键是在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农业进步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的发展又为农业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使农业迈向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主要是它们没有处理好城镇和工业发展与农村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支配下,普遍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一些国家还实行了城市偏向政策,人为扭曲要素价格,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城市地区,尤其是首位城市。这种发展模式的后果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极度的不平衡。城市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市少数富裕阶层与众多的城市贫民并存。正是农村的萧条促使大批农村人口源

源不断地流向城镇。加上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这些流徙入城的人口要么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要么失业,最终导致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贫民窟蔓延。我国尽管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城市问题。但是,在长期城乡分治的体制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可见,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是无法分割开来的,我们不能就城镇问题谈城镇问题,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农村范围内寻求农村发展的思路。实际上,许多城镇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在城镇内,但根子却在农村。同样,许多农村问题根子也在城镇里。我国 21 世纪的发展必须从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城镇发展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 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是社会分工深化的体现,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城镇化是促进社会分工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形态,城镇化对工业化具有反作用,过度城市化或城镇化滞后都会对工业化造成不利影响。一个国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是否适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滞后,城镇人口主要在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为宗主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这些国家城镇内部第三产业膨胀。这种城镇产业结构看起来与当前发达国家的城镇产业结构一样,都是服务业所占比重很大。其实,它们的性质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发达国家当前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主要是交通、通讯、金融、管理和营销策划等“生产者服务业”,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城镇服务业膨胀的是传统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十分短缺。因此,一些激进主义经济学家把发展中国家城镇第三产业膨胀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毒瘤。同样,我国在以往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在“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原则指导下,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总之,城镇化模式是受工业化模式影响的。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工业发展作基础,往往会出现城镇化超前、城市成为寄生性的城市的情况。同样,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没有城镇作为依托,也难以持续推进。

3. 处理好城镇体系内层次和规模的关系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城镇化过程中是否形成大、中、小城镇层次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分布均衡的城镇体系,是决定城镇化能否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城镇化要发挥其促进交易效率提高的功能,往往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层体系。与邻近的贸易伙伴在众多的小城镇交易,与邻省的贸易伙伴交易在中等城市,与邻国的贸易伙伴交易在大城市,涉及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则在全球城市进行。如果城镇没有这样分层体系,所有的交易活动集中在一个城市进行,这就会带来不必要的交易费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城镇体系内部,首位城市极度膨胀,工业生产集中在一两个城市。如阿根廷 2/3 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巴西 80% 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三角地带,乌拉圭 75% 的工业生产集中在蒙得维的亚,秘鲁 56% 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利马和卡亚俄地区。我国尽管没有这种首位城市极度膨胀的现象,但我国城市体系内部规模

和层次也不尽合理。在“严格控制大城市”的政策下,许多有潜力的城市发展受到人为的制约。而 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发展不足,中小城市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使 100 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人口难以控制,持续膨胀,进一步加剧了规模结构的失衡。由于没有一个合理的城镇层次和规模结构,我国特大城市的资金、信息、技术没有向外扩散的一系列中间节点,许多农村地区的交易也由于距离大城市遥远而难以进行,限制了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间的联系。

4. 处理好城镇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关系

城镇只有处于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促进人员、物质和信息的充分交流和重新配置,城市内的企业才能建立起复杂多样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不仅割断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而且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一个城市内只相隔一条马路的两个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企业之间,也不能有很好的分工和协作。城市与其经济腹地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更是存在一道道“无形的城墙”。由于城市内企业彼此缺乏分工协作,在生产、生活上不得不建立“大而全、小而全”封闭体系,造成城市里围墙高筑,大院林立,形成“城中之城”的现象。在市场化 and 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城市要扩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增强城市的国际色彩,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放眼世界,纷纷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城市的时候,必须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重视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内开放。不能像发展中国家殖民地时代的城镇那样,与国外的经济联系密切而与自身腹地的经济联系反而稀疏,城镇成为一块“飞地”,根本不能起到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目前我国地方保护主义还十分严重,统一的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妨碍了正常的竞争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城市发展与自身经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受到很大制约,进一步对内开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 21 世纪,我国须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尽快消除割据因素,形成统一的市场。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增强我国城市的国际色彩。

注释:

- ①②保罗·贝罗奇:《1700-1914 年农业和工业革命》,见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文版,368,38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③郭熙保:《农业发展论》,348~349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 ④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159~160 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 ⑤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文版,262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 ⑥F.M endels, 1972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1
- ⑦E.A.W rigley, 1986.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R. Schfield and E.A.W rigley: Population and Economy: Population and History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
- ⑧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文版,94 页,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⑨Peter Laslett, 1965. The World We Have Lost: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pp. 91.
- ⑩J. Hajnal, 1965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In Glass and Eversley: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pp. 101~143.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Q)